

1962

13卷

名誉主编
主编
副主编

李德生 吴阶平 经叔平 季羨林 张文彬
许嘉璐 路甬祥 任继愈 戴逸 袁贵仁
刘述礼 张承钧 李永田 邓星盈 魏丕植

中華人民共和國日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13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四周年华诞

1962



中華人民共和國日史

啓功



名誉主编 李德生 吴阶平 经叔平 季羨林 张文彬
主编 许嘉璐 路甬祥 任继愈 戴逸 袁贵仁
副主编 刘述礼 张承钧 李永田 邓星盈 魏丕植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史》编委会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8
ISBN 7-220-06468-3

I. 中… II. 中… III. 中国-现代史-1962
IV.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4763 号

ZHONGHUARENMINONGHEGUO RISHI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196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蒲其元
黄葵
周靖明
杨潮 古蓉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智元科贸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5

字 数

278千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7-220-06468-3/K·927

定 价

9998.00元(共50卷)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概 述

本年，全党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收到较为显著的效果，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得到有效的扭转。

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重要的工矿企业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门负责人，共七千余人，因此又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首先代表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初步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他指出：产生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会议在进一步动员全党抓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问题上，统一了对

当时经济形势的认识，并对1962年的工作作了全面具体的部署。“七千人会议”的召开，对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动员全党坚决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有重要意义。由于历史的局限，大会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因而对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不可能彻底纠正，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对某些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观点，也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

为了更加有效地调整国民经济，中央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指示》指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更适合当前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集体生产积极性。指示规定，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都应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一经确定，要长期稳定，不能任意变动。根据这一指示，全国各地农村在当年春耕前后大体完成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整工作。

2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举行，会议讨论了1962年国家经济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的情况，发现国家财政预算中还有50亿元的赤字，认为全国的经济形势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措施，下最大的决心对经济进行调整。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发表讲话。提出：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到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做出了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

切实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为此，会议决定施行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包括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

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按照这一决定，全国职工人数应当在1961年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至1072万。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年末1.2亿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同时相应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精简职工的工作，必须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调整和企业、事业、机关机构的裁并结合进行。

由于政策正确，措施得力，到本年年末，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重大成绩。主要表现为：一、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在1961年精简职工950万的基础上，1962年又净减少职工860万人。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充实轻工业，保证石油工业。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从1960年的384亿元，减到1962年的56亿元，加上自筹资金67亿元。积累率由1960年的39.6%降到1962年的10.4%。对重工业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首先是压缩钢铁产量指标，钢产量从1960年的1866万吨降到1962年的667万吨。全国县以上国营企业，3年共减少44500个。充实了轻工业品和手工业的生产，还发展了塑料、化纤、合成洗涤剂等新兴产业。三、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压缩城镇人口和停建一些无益的水利工程，本年农村劳动力增加到21278万人，超过了1957年。国家削减了对粮食的征购量，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本年，农业生产改变了前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开始回升。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县农业生产总量已经恢复或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四、稳定市场。全国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35%。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政策，加速了货币回笼。本年年末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减少了19.2亿元。银行信贷和财政实行紧缩，消灭了财政赤字，当年结余8.3亿元。

到本年年底，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许多方面都出现了

迅速恢复的好形势。

在经济调整的同时，党还采取措施对社会政治关系进行调整。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是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的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当中。建国12年来，我国知识分子有了根本的改变和极大的进步。就一般范畴说，应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人民之中。3月6日，陈毅在该会议上讲话中也指出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他还说：“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3月27日至4月16日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错误的。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加快进行对1958年以来历次运动中受到错误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这些运动包括“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

4月下旬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作出了“认真调整同知识界、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界、少数民族、归国华侨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的决定，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做好三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压缩城镇人口工作中各界人士的安置工作；甄别平反工作；对摘帽右派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此前，中共中央先后在北戴河和北京举行了近两个月的工作会议，为十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在工作会议和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多次就“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讲话、发言。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

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存在并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论断，由十中全会以全会公报的形式予以肯定。其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公报的以下文字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有必要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展，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再一次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6月16日，彭德怀向中央和毛泽东呈递了一封长信（即八万言书），请求全面审查自己的历史，并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反党小组”，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8月22日，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短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再次恳请中央组织专案组，以便弄清他犯错误的性质，作出正确处理。彭德怀的这两封信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他搞翻案的证据，受到批判。在康生的诬陷下，全会错误地批判了小说《刘志丹》，将其定为“反党小说”。曾为该小说创作提供过帮助与资料素材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也因种种原因受到牵连，被定为又一个暗藏的“反党集团”。根据上述精神，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进行审查。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东南沿海地区民兵全歼窜犯该地区的蒋介石集团武装特务。由于大陆遇到暂时经济困难，台湾蒋介石集团从20世纪60

年代初便开始积极策划“反攻大陆”，扩军备战，成立“反攻大陆”的最高领导机构，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窜犯大陆沿海地区。与此同时，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也频繁侵入我国领空和领海。为击退蒋介石集团的武装窜犯，中共中央于6月10日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做好准备。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的指示，在兵力部署和物资装备方面做了相应的部署和调整。8月2日和9月9日，解放军空军高炮部队和地空导弹部队分别击落国民党空军的美制 RF-101 高空侦察机和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大陆军民严阵以待，极大震慑了蒋介石集团，使之被迫放弃大规模军事冒险。10月1日至12月6日，蒋介石集团连续派遣武装特务窜入广东沿海地区，企图建立“游击走廊”。这些武装特务分为9股，除1股未敢登陆外，已登陆的8股和另在广东阳江山区空投的1股，均被我军彻底消灭。

中国边防部队成功地进行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1年开始，印度军队就在中印边界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并多次侵入中国境内，蚕食中国领土，挑起边界冲突。本年6月，印度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入侵中国西藏山南地区，建立军事据点，并对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甚至攻击。中国政府多次照会印度政府，对印方的侵略行为表示了强烈抗议并建议双方尽快就边界争端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了加强战备、准备自卫反击的决定。10月上旬至中旬，中印边界局势急剧恶化。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全面进攻。中国边防部队于当天奉命反击，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在东西两线同时开始。通过两个阶段的作战，中国边防部队沉重打击了入侵的印军，收复了被印军侵占的领土，拔除了印军设置的据点。至11月21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东西两线胜利完成自卫反击作战。11月22日零时，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后撤，至1963年3月1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在此前后，中国方面主动将缴获的大批印军武器、弹药、车辆交还对方，并将作战中俘获的印军官兵全部释放回国。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新年献词》。社论说，1961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战胜了连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粮食方面得到了较1960年为好的收成。目前全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情况是好的，社员生活有了改善。少数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虽然还比较困难，但情况也比上一年好。工业方面，在提前两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产品生产指标的基础上，一年来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轻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产品的质量都有提高。社论指出：“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进一步贯彻执行总路线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在国民经济中全面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完成国家计划，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进一步协调起来，使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社论提出：“在1962年中，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地争取农业生产尽可能多地超过1961年。这对于国计民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社论还强调，1962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一年，农、工、商、学、兵、政、党和群众工作等各个方面，都要鼓足干劲，实事求是，在当年内创造新的成就。社论充分肯定了大跃进中建立的社会物质基础，号召全国人民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

当日 《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署名文章《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权威问题》。文章认为，恩格斯《论权威》一文“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文章指出，按照恩格斯

的观点，任何现代化的生产都不能没有统一的指挥，都必须“有一个支配的意志来解决所属的一切问题”，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是作为政治权威，同时也是作为经济权威出现的，它负有领导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国家根据全国的资源、设备、劳动力等各种情况，通过科学的计算，从全局出发，根据需要与可能，制定出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尽量使计划符合于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它是国家的意志，也是人民的意志，这就是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服从这个意志，服从这个权威。文章说，计划、纪律、规章制度等等，一经制定，就带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同时也是一种必然性，当人们能够认识这种必然性的时候，自觉地服从，才能够有自由，才能把工作做好。该文对当时中央加强集中统一的方针作了很好的理论阐述。

当日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举行盛大宴会，热情招待在北京帮助我国建设的各国专家。陈毅副总理在宴会上讲话。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衷心感谢各国专家在过去的一年中以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辛勤劳动，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在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采取许多具体办法，克服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暂时困难方面，取得了新的胜利。在迎接 1962 年的时候，我们满怀信心地瞻望未来，我们坚信，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依靠我们勤劳的双手，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陈毅副总理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全世界充满了光明的前景，帝国主义的日子是愈来愈不好过了。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最近以来更加毒辣地使用卑鄙的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因此，维护和加强世界人民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特别是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最后强调说：中国人民一向把维护这种伟大的团结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今后我们仍将同过去一样，始终不渝地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保护这种伟大的团结。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

量，团结就是胜利。我们坚信，只要全世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加强团结，坚持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致词祝酒。

当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印度尼西亚中央工会代表团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势、印度尼西亚人民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工会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康永和，全印度尼西亚中央工会代表团团长、国际部部长穆罕默德·多希尔分别代表双方在声明上签字。双方一致指出，当前西伊里安的殖民主义问题，严重地破坏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民族独立和安全，并威胁着东南亚的和平；只有使西伊里安回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管辖之下，除此是没有别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的。美帝国主义霸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台湾，严重地侵犯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和主权，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和东南亚的和平。

1月2日 新华社报道，1961年我国钢铁工业的新成就。报道说，我国炼钢企业1961年试炼成功40多种新的钢种，试轧成功30多种新品种的钢材。这些钢种和钢材都已陆续进行试生产和正式投入生产。在新钢种中，用高矽钢轧制的矽钢片，物理性能和机械性能都比较好，加工不易折裂，既省料，又坚固，在电气设备制造中有广泛用途。1961年生产的钢材新品种，都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的重要品种，像低合金钢板、薄壁无缝钢管、不扭转钢筋、道岔轨等，是制造汽车、拖拉机、发电机、矿山设备及铁路建设的重要钢材。报道说，目前我国钢材的品种规格比国际上使用的要少，要进一步提高钢材的生产水平，还需作很大的努力。

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应邀出席古巴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奥斯卡·皮诺·桑托斯举行的招待会，热烈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三周年。陈毅副总理在招待会上讲话，他赞扬古巴人民的革命胜利是当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为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大大鼓舞了全世界

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意志。他谴责美国政府最近以来积极策划利用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采取集体干涉行动的同时，正步步加紧地准备再一次发动对古巴的武装进犯。他指出，古巴人民绝不是孤立的，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坚决地站在古巴人民这一边。美帝国主义任何新的军事冒险，都将以更加可耻的失败而告终。最后，陈毅副总理再一次强调中古两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始终互相支持、互相鼓舞，中国人民把支持古巴人民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崇高的国际义务。他说：古巴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将永远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当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古巴革命事业必胜》。社论说，古巴革命的胜利，是我们现时代的一件具有深刻的、伟大的世界意义的事件。古巴人民的革命和斗争的胜利，不仅为古巴人民赢得了独立和自由，而且有力地鼓舞着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这是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遭到的一次最大的打击，使它的“泛美体系”陷于支离破碎，大大有利于拉丁美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社论指出，古巴革命和它的胜利证明：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要敢于革命，敢于拿起武器来同哪怕是最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就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就可以战胜帝国主义侵略者。社论重申：“曾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可靠、最忠实的战友。”

1月3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同时受到接见的还有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及夫人以及安井郁的女儿安井侑子等，毛泽东同安井郁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刘宁一等也参加了接见。4日，首都各界人士1500多人在政协礼堂集会，欢迎安井郁理事长。安井郁在会上作了题为《日本人民争取真正独立和和平的斗争必将冲破反动的浪潮获得胜利》的长篇演讲。

当日 国务院作出规定，所有金银买卖调拨，一律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

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分别打电报给缅甸联邦总统吴温貌、总理吴努、外交部长藻昆卓，祝贺缅甸联邦独立 14 周年。

1 月 4 日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团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及附件《共青团在学校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草案)》。1961 年 10 月 4 日至 26 日，团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认为，近年来学校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针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在贯彻“兴无灭资”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某些政策界限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由于“红专”和所谓“白专”的概念含混，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读书，影响了部分同学的积极性。为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特制订《思想政治工作纲要》，在高中以上试行。《纲要》规定，共青团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团员，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当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集体主义的光辉》。社论说，10 年前，山西长治专区出现的 10 个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已是当地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农林牧副业都有很大增长。社论说，10 个老社 10 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正是全国农民所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改变了几千年来使农民“陷于永远的穷苦”的状况，使他们摆脱了风雨飘摇的小农经济的困境。从 10 个老社集体经济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党所制定的有关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办好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党所规划的农民组织起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是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的。社论要求，要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使全体社员都自觉自愿地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为着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共同奋斗。

当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作了

关于西藏情况的报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主持报告会。

当日 中华书局在北京举行成立 50 周年纪念会。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胡愈之，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出席了纪念会，齐燕铭在会上讲了话。中华书局 1912 年 1 月 1 日创办于上海，出版过不少教科书、教育用书、工具书、古籍、期刊，对文化事业有过一定的贡献。解放后专业整理出版我国文、史、哲古籍，并适当出版现代作者有关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著作。

1 月 5 日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聂荣臻、陆定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首都科技工作者。来自科学研究、设计、生产、教学、医药卫生和国防科学技术等各个岗位的 4000 多名科技工作者出席了宴会。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致词，号召科技工作者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为了世界和平，树立雄心壮志，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在 1962 年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陈毅副总理在长篇讲话中说，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工作者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勉励科技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在工作中和治学中要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专心致志，踏踏实实，不浮夸，不图侥幸，准备付出毕生的精力攀登科技高峰。

当日 国家体委公布 1961 年体育运动成果。公报说，1961 年共创全国纪录 102 项，占已公布的全国纪录的 1/3 以上，其中包括由陈镜开、王锡华等人创造的 9 项世界纪录(射箭、举重各 1 项，跳伞 2 项，航空模型 5 项)。公报说，1961 年在游泳、射箭、举重等项目上打破全国纪录最多。其中游泳刷新纪录 20 项，占全部项目的 2/3 以上；射箭 20 项，全国纪录被刷新 14 项；举重 28 个项目中被刷新 16 项。在田径方面，福建选手倪志钦跳过了 2.11 米的高度，列世界第四位。公报说，在这次公布的 300 项全国纪录中，属于 1961 年前创造的共 198 项，其中 1960 年 122 项，1959 年 61 项，1958 年 10 项，1957 年 3 项，

1956年和1954年各1项。

当日 1962年1月是中国福利会出版的综合性外文月刊《中国建设》杂志创刊10周年。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在这个杂志最近出版的1962年1月号上发表了题为《真实报道的传统》的纪念文章，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分别在这一期杂志上题了词。宋庆龄在文章中回忆了中国福利会及其前身保卫中国同盟的各种出版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如何不顾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新闻封锁，始终不渝地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真实情况的情形。宋庆龄在谈到《中国建设》的出版时说：这个刊物从创刊伊始，就一直致力于描述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成就，并且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来阐明人民政府的政策。她指出，在国际问题上，我们的杂志不断地提醒各国人民，要警惕他们今天的主要的和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周总理的题词是：“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

1月6日 《中国建设》杂志举办庆祝创刊10周年展览会。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各



1月6日，由中国福利会主办的综合性外文杂志《中国建设》庆祝创刊十周年，并举办庆祝展览会。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和周恩来、陈毅、邓颖超等参观了这个展览会。

界人士，参观了这个展览会。展览会具体介绍了《中国建设》杂志创刊10年来的编辑内容、推广发行、读者反映等各方面的情况。该杂志是中国福利会在1952年1月创办的，以英文和西班牙文两种文字出版。当时

的发行范围已经达到世界上 153 个国家和地区，它为传播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的友好愿望、加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

当日 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骨科学术会议——中西医结合骨科学术座谈会在天津市结束。座谈会上宣读和讨论了近两百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从中医、西医以及中西医结合方面，论述了骨折、软组织损伤、脱臼、骨科疾病机制和骨科基础理论等问题，反映了我国骨科医疗工作和研究工作的新成就。全国著名骨科专家和来自 16 个省市以及部队、铁路系统的骨科医务工作者，都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前来参加这次学术会议。他们对“固定与活动的关系”、“血肿对骨折愈合的作用”、“中药对骨折愈合机制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绝大多数的闭合性长管状骨折，不动手术也可以获得满意的疗效；但并不排斥手术疗法，因为它仍然是骨科治疗中的重要方法之一，也应当予以重视。座谈会结束时，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作了总结发言。他总结了全国中西医结合骨科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这次座谈会的主要收获，并号召骨科中西医生再接再厉，团结合作，根据自己的特长，分工协作，系统地总结经验，开展对复合骨折和叉趾等方面的研究，加强对骨科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探讨，以进一步提高骨科水平，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的健康服务。

1 月 7 日 新华社报道，青海西宁地区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的学术活动很活跃。最近两个月来，举行的学术讨论会和报告会就有 30 多次。讨论和报告的内容广泛，既有对工、农、牧业生产和各项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讨论，又有对遗传学说等理论问题的探讨。许多学会在举行学术讨论会时，除会员参加外，还邀请有关的工作人员、大专学校教师、土专家等参加讨论。对于学术上的各种不同意见，尽量展开自由争论。对于一些一时无法解决的分歧，不强求一致，不急于作出结论。

1 月 8 日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和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在平壤签订